

G U Y U W E N T I S H U L U N

古『语』文体述论

夏德靠◎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GU YU WEN TI SHU LUN

古『语』文体述论

夏德靠◎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语”文体述论: 英汉对照 / 夏德靠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1.1

ISBN 978-7-5171-2341-5

I . ①古… II . ①夏… III . ①文体—研究—中国—古代—英、汉 IV . ①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50163 号

责任编辑 罗 慧

责任校对 张 丽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6 号院 B 座 6 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8 印张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54.00 元 ISBN 978-7-5171-2341-5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格言体	8
第一节 格言体的生成.....	8
一、格言体的内涵	8
二、乞言	13
三、赠言	27
第二节 格言体的形态.....	49
一、散见式	50
二、汇编式	62
三、著论式	73
四、专书式	83
第二章 对话体	89
第一节 对话体的生成.....	89
一、规谏	90
二、咨政	104
三、教学	110
四、清谈	120
第二节 对话体的形态.....	138
一、问答式	138

二、省略式	147
三、评论式	154
第三章 事语体	161
第一节 事语体的生成.....	161
一、事语体的内涵	161
二、言事相兼传史方式的产生——“事语体”文献生产 ...	168
第二节 事语体的形态.....	182
一、言显事隐	182
二、言隐事显	191
三、言事并重	199
四、编年本末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	221
第四章 专论体	236
第一节 专论体的生成.....	236
第二节 奏疏体的生成.....	247
一、奏疏的起源	247
二、从口头言事到书面言事	252
第三节 奏疏体的类型.....	258
一、奏疏的分类	259
二、奏疏的编撰	262
结 语	268
主要参考文献	271

绪 论

就早期文献来说，古“语”文献毫无疑问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认识到这一事实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对于古“语”文献，前人其实也是有所觉察的，并且还思考过其生成及演进的问题。比如，前人对于古“语”文献的认识，一种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提出“左史记言”，以及“言为《尚书》”的说法。这个说法长期主导着人们对“语”类文献的认知。刘知几的“六家”说中就有《尚书》家，而依据注家的看法，所谓的“《尚书》家”，即指记言这种史体而言的。不仅如此，刘知几还接触到古“语”文献的发展问题，指出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经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过程。他的这些看法无疑丰富了对古“语”文体的认识。不过，自刘知几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有关“语”类文献的探究鲜有发现。比较起来，前人的认识与“语”类文献的实际地位是不相称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人们逐渐认识到古“语”文献的意义。李零曾经这样说过：“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因为这种史书，它的‘故事性’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和‘再创造’。它和它所记的‘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最丰富，出土发现也非常多。”^①又说：“这类发现，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都是孤例，直到90年代，等到上博楚简发现，我们才突然意识到，这是古代史书中数量最大也最活跃的一种”。^②正是

① 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2页。

② 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3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于有了新的材料，人们凭借这一有利条件又开启了对古“语”文献的探索之旅。

很早以来人们非常注重对文体的辨析，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可是遗憾的是在这些著述中很少找到有关古“语”文体的论述。这种状况意味着当时的“语体”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或者说，人们还没有自觉将“语体”作为一种文体予以对待。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个时期就没有涉及这个话题，事实上，在一些史志目录或注家的解释中，我们能够看到有关语体的论述。《国语·楚语上》提到“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①这是申叔时在阐述如何教育太子时所说的，“语”显然是一种教材。至于申叔时所说的“语”所表现的具体文体形式如何，现在无从判断。然而，申叔时的说法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语”具有“明德”与“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的双重作用，这似乎表明“语”所载录的应该是富有教益的话语。韦昭把“语”解释为“治国之善语”，应该说韦昭的解释是符合申叔时的看法的。但应该指出的是，韦昭的训释除受到申叔时的启发之外，大约与刘向的看法有些渊源，何晏《论语集解叙》说“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②，刘向明确把“语”释为“善言”，这与韦昭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表明韦昭或许曾借鉴刘向的看法。不过，除刘、韦二人看法外，对于“语”还有其他不同的认识，《汉书·艺文志》指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③邢昺《论语疏》也说：“郑玄《周礼》注云‘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④董增龄在解释《国语》时说：“言者直言，语者相应答。《国语》载列国君臣朋友论语，故谓之语。”^⑤他们不同于刘、韦之处是把“语”解为应答之辞（语），看来他们解释的立足点在于“语”的形式。皇侃《论语义疏叙》说：

①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② 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③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7页。

④ 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 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出版社，1985年版。

“语者，论难答述之谓也。《毛诗传》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郑注《周礼》云：‘发端曰言，答述为语。’今案此书，既是论难答述之事，宜以论为其名，故名为《论语》也。”^① 皇氏释“语”为“论难答述”，与班固诸人的说法稍异，但仍是形式方面立说。从词义的角度来考察，“语”确有“论难答述”之意，《说文》云：“语，论也。”段《注》说：“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② 从上述诸说来看，它们对于“语”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从“语”的内容方面着眼，认为“语”是“善言”，此说大体起于申叔时，而为刘向、韦昭所坚持；另一说法是从形式方面立论，指出“语”为论难应答之辞。这是我们在史志目录或注家的解释中发现的有关古“语”文体的看法，或者说有关古“语”文体的传统认识。

目前，古“语”文体仍然是探究的重点所在，这些认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其一，“语”是一种记言文体。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认为“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③ 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认为“语”直到《国语》成书后才完备起来，“国策”“事语”是“语”的一个分支，而格言警句以及谚语、俗语是从“语”中提炼出来的。^④ 姚琳琳《〈国语〉对话的文学与思想意义》指出，“语”在先秦时期是记载君臣朋友间论说、对话的一种体裁，包括“隐含式”对话、“时空交错式对话”、问答式、“独白式”对话。^⑤

其二，“语”是一种叙事文体。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指出，“语”以“事”为主，是掌故类的史书（“事语”），其“故事性”胜于记录性。^⑥ 廖群

① 严可均：《全梁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4页。

②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③ 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④ 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⑤ 姚琳琳：《〈国语〉对话的文学与思想意义》，2011年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⑥ 李零：《简帛古书和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2页。

《“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认为，“语”是先秦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①

其三，“语”是一种既叙事又记言的文体。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指出，“事语”表现为“既叙事，又记言”。^②李坤《〈国语〉的编撰》指出，《国语》属于“语体”史书，是以记述人物语言为中心，前后作叙述，使一件史事及因果基本明了，内容独立成篇、自成体系的一种早期阶段的过渡型史书体裁。^③史继东《〈国语〉材料遴选原则新探》指出，《国语》全书虽然以记言为主，但并没有单纯记载言论的材料，主要是记言记事并重，甚至是以记事为主的材料。^④李炎乾《〈国语·吴语〉新探》指出，“事语”主要是以记言为主，以记事为辅的文体。^⑤

其四，“语”存在记言与记事两种文体。黄丽丽《〈国语〉的性质与价值》指出，“语”既指俗话、谚语或古书中的话语，又指对史事、时事所做的评论，有时“语”全是记事（可引申指故事或传说）。^⑥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主张“语”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类，每一类又表现为散见的和结集（或成篇）的两种。^⑦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指出，“言”的基本形式为教令和格言警句（包括格言警句的集锦），“语”指具有论说性质的格言警句、谚语，但以“语”为名的文本主要表现为记言记事相杂的特点。^⑧赵辉《先秦“语”体的发生、演化及内在脉络》认为最早的语体是具有格言性质的古“语”，在此基础上演化出“训语”和“事语”。^⑨

① 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② 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③ 李坤：《〈国语〉的编撰》，《史学研究》，1988年第4期。

④ 史继东：《〈国语〉材料遴选原则新探》，《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

⑤ 李炎乾：《〈国语·吴语〉新探》，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⑥ 黄丽丽：《〈国语〉的性质与价值》，《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⑦ 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

⑧ 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⑨ 赵辉：《先秦“语”体的发生、演化及内在脉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上述看法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古“语”文体的若干特性，但是，具体就某一类看法而言，又很难说明古“语”文体的整体特征，也无法显示作为文类的古“语”之文体特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比如将“语”作为一种叙事文体，此看法对于古“语”文体中的“事语”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事语”呈现为“既叙事，又记言”的文体特征，因此，从整体出发，将“事语”视为一种叙事文体也未尝不可。不过，倘若进一步考察“事语”，不难发现在“事语”内部，又存在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这些差异。言隐事显中“事”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言隐事显型呈现非常明显的叙事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言事并重型也是如此，自然也可视为叙事文体。但是，言显事隐这种类型，考虑到其言论的因素主导文本的构成，这样，将它看作叙事文体就难以反映此类文本的实际特征。如此看来，即使就“事语”而言，也不是全部可以当作叙事文体看待的。由此，再进一步考察上述诸种看法，可以清楚看到它们各自的局限。事实上，古“语”文体在实际演进过程中，业已发展为一种文类，包含若干次生文体，就其篇章语体而论，具体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格言体是纯粹的记言文体，专论体倘若就奏议而言，也属于纯粹的记言文体。至于对话体，要视具体情况来定，它可以属于记言文体，也可以属于叙事文体。因此，将古“语”文体视为记言文体也好，叙事文体也好，还是既叙事又记言，这些看法大抵只是切中一些次生文体的特征，而不能将它们视为对古“语”文体的整体归纳。

其实，要比较彻底地描述古“语”文体的特征，应该从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所谓篇章语体，主要指单篇语体。所谓专书语体，是基于专书而言，如语录体、国别体、世说体等。只有结合这样两个层面，才能比较好地澄清古“语”文体的演进及其特征。不过，尽管人们对古“语”文体的研究通常也涉及这两个层面，但这种研究往往是不自觉的。首先，就目前相关研究来看，似乎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其次，人们对古“语”文体进行考察时，似乎常常将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混合起来研究。例如《国语》，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将其列为一家人，长期以来《国语》被视为“国别体”

的典范之作。沈长云认为,“《国语》并不是一部史,它的目的并不在于纪事。以国分类,也不是它的主要特色”,在他看来,《国语》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语’,是按国别汇集成的‘语’”,并强调它是“一部议论总集”,从性质上来说,《国语》“显然属于《事语》一类”。^①黄丽丽指出,《国语》为先秦“语类”之集大成,其文体为“语体”。^②张岩在《春秋战国文体源流考略》一文中具体讨论了《国语》中一些特征较分明的“文体”:讥语文体、劝谏文体、赞语文体和问答文体。^③又如《论语》,谭家健认为《论语》是“后世语录体的鼻祖”。^④有的研究者则把《论语》的文体概括为纯粹的语录体、概括的问答体和相对完整的问答体。^⑤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之间无疑存在密切联系,一部专书语体常常会容纳一种或多种篇章语体,比如《国语》,在专书语体上属于国别体,而从篇章语体来看,它包括对话体、事语体。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国别体包括对话体、事语体,那就会产生误解。国别体真正的文体内涵基于两点:一是分国编纂,二是记言。因此,如果将国别体等同于对话体与事语体,只能揭示国别体记言的特点,而忽视了其分国编纂的一面,这种理解自然是片面的。又如《论语》,就专书语体来看,它属于语录体;倘若就篇章语体而言,它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等。如果说《论语》文体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个说法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因此就认为语录体就是指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语录体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说语录体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只指出了语录体记言的一面,而没有指出其记行的特征。由此看来,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之间尽管存在联系,但由于两者分类的依据不同,二者之间并不能完全等同。这样,只有将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揭示古“语”文体的特征。

就目前看来,关于古“语”文体的分析大体存在上面几种思路。这些不同

① 沈长云:《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5-306页。

② 黄丽丽:《〈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③ 张岩:《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07-411页。

④ 谭家建:《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⑤ 侯文华:《〈论语〉文体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思路以及引发的不同看法，表明当前在古“语”文体研究上不但呈现多元的研究局面，同时也意味着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延展空间。因此，本书在充分借鉴、吸纳前哲时贤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文类的角度分析古“语”文体的类型及其生成。在类型上，我们主要从两个层面加以展开：一是从篇章的角度出发，将古“语”文体划分为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四种形态；二是从专书的角度出发，将其划分为国别体、语录体及世说体三种。考虑到人们对专书语体讨论较多，故在具体论述时，将篇章语体作为重点，即以篇章语体为主，以专书语体为辅。在论述篇章语体时，着重分析每一篇章语体的生成过程，以及每一篇章语体的具体存在样态。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力图对古“语”文体做一整体的鸟瞰，并且揭示其演进之轨迹。

第一章 格言体

“语”是一种起源颇为古老的文类，而就是在这个古老的文体家族中，格言体无疑又是较早出现的，并且在早期语类文献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格言体，一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比较早地出现，自然与先秦社会的重言风气密切有关，当时存在的一些重言仪式催生了这种文体。另一方面，早在先秦时期，格言体已经充分展现了它的弥散性魅力，它丰富多彩的存在样态不但证实了其本身旺盛的生命活力，使它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应有的智慧力量；同时透过这些样态，我们看到它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语类文献的发展。

第一节 格言体的生成

格言体能够在先秦时期很早就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实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在此，我们不准备全面梳理这种关系，而只是重点考察两种仪式行为，以此来窥探格言体的生成。

一、格言体的内涵

什么是“格言”，我们先来看两部权威辞典的解释。《辞源》是这样说的：“含有教育意义可作为准则的话。”^①《辞海》则说：“熟语的一种。可为法式的言简意赅的语句。”^②比较这两种说法，共同之处在于指出了格言的准则、法式

①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67页。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5页。

的特征，也就是强调了格言所蕴含的教育意义。然而，《辞海》不但指出格言为熟语之一种，并且还指出格言“言简意赅”的特征，也就是从形式上描述了格言的形态。由此看来，《辞海》与《辞源》有关“格言”的看法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对“格言”进行定义的困难，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论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格言”进行一些说明。

还是从熟语谈起。《辞海》解释“熟语”说：“语言中固定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且要以其整体来理解语义。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①依据这里的看法，格言与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均属于熟语。然而，人们对于熟语的认识事实上与此有所差异。据考察，熟语“是在五十年代出现的一个译词，是从俄语或英语翻译过来、按照汉语的构词方法而创造出来的新词”，^②也就是说，熟语其实属于外来词。然而，传统上早已有谚、传言、俗谚、俚语、鄙语、直语、至言、法言、野语、谣谚、格言等称谓，那么，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尽管存在熟语到底是种概念还是属概念的争论，但一般认为熟语是种概念。^③在承认熟语是种概念这一前提下，除了《辞海》的分类法之外，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强调“熟语”与“成语”为并列关系，它下辖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对于后一种做法，有的学者认为将“熟语”与“成语”为并列，“就弄乱了概念的层次性”，因此，还是以前一种分法较为合理。^④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将“俗语”视为一种独立的熟语语种。汉代文献已经出现“俗语”的名称，唐宋以来特别是元代杂剧、明清白话小说中“俗语”得到了广泛的引用。俗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们将狭义的俗语定为：通俗而形象地描述人情世态的定型的语句。这些主要流行于民间大众的通俗语句，通常用比喻、形容、夸张或直接说明来描写表达出怎么一回事、怎样一种人。……另外，我们将人们通用于普通交际场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7页。

② 牛思涌：《熟语探微》，《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姚锡远：《“熟语”的种属地位及其定义域》，《汉字文化》，1998年第2期。

④ 孙维张：《关于“熟语”的概念》，《汉语学习》，1982年第3期。

合中的套话，和旨在表露人的心情、感情的通俗语句，也归为狭义的俗语范畴。”^①实际上有的学者确实“在熟语中明确了俗语的位置”。^②这样，熟语这一家族似乎应增加一员。

按照《辞海》的说法，既然格言与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均为熟语的属类，那么，它们之间应该是互不相属的。一些学者同意这样的说法。有人认为“格言的内容和形式有它自身的特色，它与谚语、成语、名句不同”，比如多数格言摘自古代名家著作，文言色彩浓重；而谚语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这就决定了谚语用词的口语化，易于上口、广为传播。^③有人认为谚语多出自集体创作；格言往往是名人语录。^④有人认为谚语有广泛的社会性，有平衍质朴的通俗性；而格言则突出其针对性，用词也比较温文尔雅。^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王书贵在《谈谚语》这篇文章中从四个方面辨析格言与谚语的差异：一是从来源来看，格言大都来自书面语，谚语大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口语；二是从使用场合来看，格言多见于书面语中，而谚语多见于群众的口语之中；三是从稳固性来看，格言稳固性很强，不能随意加以变动；谚语因为流传于人民口头，内容相同的谚语在结构的繁简上可以不同；四是从语体风格来看，格言具有书面性，谚语具有口语性，格言不如谚语通俗、活泼。^⑥但是，本书认为，关于格言与谚语的关系，人们过于强调二者的差异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人们突出谚语口头创作的特征，其实有的谚语来自于历史故事，有的甚至来自于诗文。^⑦因此，有学者认为格言与谚语虽然有区别，“但是有时候是难分辨的。流传很广、大家熟知的格言就跟谚语没有什么区别；很多谚语也有格言的性质”^⑧。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格言与谚语之间是

① 徐建华：《俗语，一种独立的熟语语种》，《衡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② 徐晓敏、孙静：《熟语中俗语类的界定》，《绥化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③ 景士俊：《试论格言》，《内蒙古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④ 朱千波：《论谚语》，《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⑤ 孟昭泉：《试论格言的分类》，《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⑥ 王书贵：《谈谚语》，《湖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Z1期。

⑦ 朱千波：《论谚语》，《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⑧ 璩一：《成语、谚语、格言、俗语、俚语的区别》，《语文学学习》，1958年第1期。

可以互相转化的，特别是在早期社会，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

“谚语的内容不出两个方面：第一是人类观察和研究一切自然界现象，跟大自然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在一代代从事劳动生产、养成熟练技巧、创造物质财富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教训；第二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类在进行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教训，包括人们对于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等等方面的观点认识。”^①即人们通常将谚语划分为自然谚语与社会谚语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中，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着重的是自然谚语的意义，“过去劳动人民没有受到科学教育的机会，可以凭着实际经验的积累，他们掌握了自然的规律。许多关于天文、气象、农事、畜牧以及医药卫生的谚语，往往无比的准确，而且符合了科学的理论。远在东汉时期，崔寔就曾辑录过‘农家谚’，其中有若干条直到现在还是广大农民在生产中奉行的准则，对他们的耕种、蓄养等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和帮助作用。最近有人研究民间有关气象的谚语，逐条加以论证和分析，结果大部分是和现代气象学原理暗合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劳动人民的惊人的智慧和辛苦钻研的精神”。^②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自然谚语的地位得到提升，从而谚语的民间性质也就凸显出来。这也是人们之所以坚持格言与谚语区分的重要原因。可是，据有的学者分析，“先秦的谚主要是说明生活哲理的，而汉以后的谚除了这方面的内容以外，还广泛涉及天文、气象、农事、风土、民俗等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③这当然绝不是说先秦时期就不存在自然谚语，事实上《周易》《诗经》中早已出现天时占验和狩猎畜牧农耕等方面的谚语。这个判断整体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人们注意到，在杜文澜辑录的《古谣谚》一书中，先秦时期的谚与后世农谚之类确实是大不相同的。^④这也就是说，谚语的内涵其实并不是静止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所谓“谚”，《说文》段

① 王骥：《论我国古代的谚语》，《文史哲》，1958年第11期。

② 朱泽吉：《论谚语的艺术》，《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

③ 吴静：《谣谚考辨》，《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④ 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